

# 对历史的 宏观思考

文

史

科

学

新

视

野

从

书

NEW

VISI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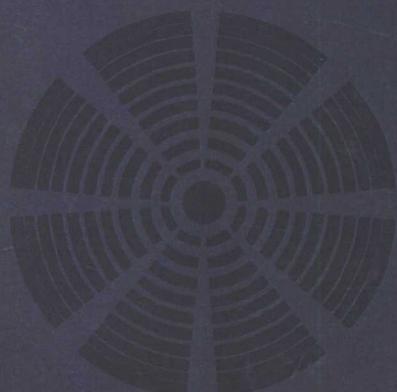
O 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丁伟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对历史的 宏观思考

交 叉  
科 学  
新 视  
野 从  
书

NEW

V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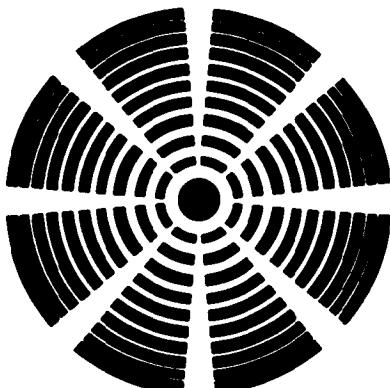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丁伟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历史的宏观思考/丁伟志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

(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赵红州主编)

ISBN 7-5434-4293-0

I . 对… II . 丁… III . 史学·研究 IV .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60 号

---

书 名 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对历史的宏观思考

作 者 丁伟志

责任编辑 李连保 杨惠龙

杨玉岭 孙新龙

张贻珍

特约责编 田卫平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刘 昕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34-4293-0/O·40

定 价 10.9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  
谁能排大难，不肯计奇功。  
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  
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屈大均：《鲁连台》



## 简 历

丁伟志，1931年1月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1948年7月起，先后在华东大学、山东大学工作。1951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3年初，转入马列学院进修哲学。1955年起，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73年秋，转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国通史》的编纂。1975年起，先后担任《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从50年代起，致力于哲学和历史学研究，主攻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和史学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中西体用之间》、《无树有巢》、《桑榆槐柳》等。

丁伟志  
1998.10

# 目 录

---

第一章 历史学中的宏观研究 .....	1
第一节 与微观研究相对待的宏观研究 .....	1
第二节 与顺向考察相对待的逆向考察 .....	14
第三节 从多样性中把握统一 .....	22
第四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	39
第二章 宏观视野中历史进程的基本属性 .....	47
第一节 人类历史是特定的暂时性过程 .....	47
第二节 人类历史是延续与变异的统一 .....	58
第三节 人类历史曲折前进的总趋向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说起 .....	74
第三章 对中国思想史宏观考察的若干尝试 .....	107
第一节 论思想史不是一部政治路线斗争史 ——驳“儒法斗争”说之类 .....	107

第二节 对一种传统学说体系演变轨迹的考索	
——论儒学的变迁	127
第三节 从分析一种哲学学说的性质看“两军对垒”的哲学史观	
——张载理气观析疑	141
第四章 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宏观考察的若干尝试	177
第一节 论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	177
第二节 “中体西用”概观	186
第三节 本世纪初的文化自省	199
第四节 重评“文化调和论”	219
跋	249

# 第一章

---

## 历史学中的宏观研究

### 第一节 与微观研究相对待的宏观研究<sup>①</sup>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作为两种相区别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使用“宏观”“微观”的概念，已经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使用它们，含义上有了明显变化。

应当说自从历史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宏观的历史研究和微观的历史也就存在了；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提炼出来

---

<sup>①</sup> 本文最初以《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为题，发表于1981年8月25日《人民日报》，1982年收入《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一书时作过一些修改，这次收入本书时又根据全书体例所需，作了一些增删。

罢了。

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一部历史著作，不管其规模何等闳阔，即使是汇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也只有在具体的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构筑成功。历史的真实性，无疑是任何史学著作的第一价值尺度。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原则的历史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微观的历史研究方法，都需要去研究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人、事、地、物，或者说，都必须从小的角度去观察与考索历史的局部、细部。对于历史的局部、细部考察的愈加细致、周全、准确，自然对于从整体上正确认识由这些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就愈有保证。如果细节俱错，大局的真实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人类历史繁复纷纭，研究者是无法把它穷尽的。即使一人一事或一岁一月之史，人们也没有可能穷其细节，具其始末，何况历史学的任务也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细大不捐地记录历史事实呢。古今一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总是抱着比记事更高的大目标去治史的。这种目标，当然有各种各样，有的荒诞错谬，有的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或进步性。但是不管其间差异多么大，还是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条共性的轨迹，这就是：可以而且必须从大的角度，亦即从相对的整体意义上，去考察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历史的本质。这种考察，就是从事宏观的历史研究。司马迁明白表示，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且不论“究天人之际”能否成为著述历史的目的，仅就“通古今之变”而言，也可以明白看出，《史记》之作的眼光，确非只停留在记录和整理具体史实和个别事件上，而是

试图从宏观上去观察历史，探讨古今变化之道。“通古今”，当然眼光便需放开，更不必说“究天人”了。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意图，确乎如梁启超所说，是为了编一部“皇帝教科书”。按照今天的价值标准来看，这种治史目的无疑是不足取的。但是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为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的目的，推动着司马光以继承《春秋》为己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上下求索，纵观中国政治史上的成败得失，终于才写成这部取精用宏、贯穿古今的巨著。

中国历史学的典籍可以证明，优秀的古代历史学家一直是采用着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只不过他们只是把两种研究方法混同在一起使用，长期没有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连两种方法间存在着差异、构成矛盾的情况也无所察觉。刘知几曾经论及搜求记载史实与编纂历史著作的关系，他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sup>①</sup> 可以看出，刘知几从历史著述形成的程序上，认识到记录史实与从事著作的前后不同，各有侧重，并且认识到二者是“相须相成”，但是显然他只是把二者作为治史的两道工序来看，并未认清治史的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相异而又相须的研究方法。

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形成两种不同的、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研究方法，乃至由此而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分支。这是历史学经过长期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会出现的局

---

<sup>①</sup> 《史官建制》，《史通通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面。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史上，大概可以说，只是到了清代乾嘉年间，才呈现出微观历史研究方法比较充分发展的局面。这时候，以经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考据学派大兴，这股潮流兼而波及史学。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也就成了研究学问的主要方法。把治经的考证方法移来治史，考证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成为当时历史学界的风尚。到了这时候，以考据为基本方法的微观历史研究，才在中国史学史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并且被奉为治史的正宗。与此相适应，训诂、名物、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等等，也一并发展起来，俨然形成一个独立学科。胡适把乾嘉学派的考证法，说成是惟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过分之词。但是，乾嘉学者们能够给予微观历史研究以足够的尊重，使它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力求通过详尽无遗、颠扑不破的考据来验证历史史料，把历史学从充斥荒谬神秘的状态逐步移到比较可靠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力图使之成为信史，这无疑是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应当承认，乾嘉学者们以考证为特征的历史研究法，不仅在学术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有着值得吸取的价值。

至于说到宏观历史研究，截止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入之前，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没有得到过充分发展的。不少学者对于古今大势，发过议论，作过揣度，其间也不乏精彩的见解，可惜都简约得很，构不成系统的具备理论形态的历史方法论。大家如刘知几、章学诚辈，也没有能够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的学说来。北宋邵雍曾经按照他所创制的象数学，推演出一套“元、会、世、运”的历史哲学，企图说明历史遵循其内在的必然律周而复始地循环，但是由于它蒙上了过于浓重的神秘色彩，在历史学界也影响甚微。清末民初，进化论传

来，一时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波涛，人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崭新的历史观，拿它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进化论的输入，对于中国历史理论的革新，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不过限于当时条件，也未能在中国形成发达的宏观历史研究的学风。况且，把解释自然界生物史的学说，生硬地套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自然会引申出一系列荒唐结论，陷入曲解历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

从传统上看，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史上，宏观历史研究虽然不够发达，但是对于微观历史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有些历史学家却早就有所察觉。例如，乾嘉之学全盛的时候，章学诚就已经看出囿于考据的治学方法产生的弊端，并屡加诟病。

没有疑问，微观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历史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那就会铸成错误。具体来说，第一，由于只是把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课题的确定，便往往难以考辨其轻重缓急。琐细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可以竭研究者的精思，重大历史问题却往往被置诸脑后。从历史学的整体发展需要看，无疑应有一批研究各种具体问题、乃至研究各种常人不注意的偏僻问题的专门家。他们的劳作是理应受到重视和尊敬的。不过，如果整个历史学界都走上此途，历史学所应承担的使命便不能不轻重倒置了。第二，对于个别对象的考察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范围里观察它，不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观察它，那么对于个别对象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管中窥豹，其实是连豹的一斑也不能真正认识的。第三，历史全局不等于它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因此即使对于个别历史现象无一遗漏地做了细心考察，也不等于认识了历史全

局，正像把每棵树都分别一一进行了考察，并不能说就从整体上认识了由这些树所组成的整个森林。

就具体的某些历史学家的研究项目来说，或者就某些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项目来说，在特定的目标下，相对地离开宏观角度而去进行微观考察，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说这是历史学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加分析地对主要采取微观方法的历史研究工作一概鄙薄，妄加讥诮，那是很错误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只把这种微观的历史研究当成惟一的真学问，排斥宏观的历史研究，那么这种微观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走向反面，变成认识历史全貌和内在联系的障碍。章学诚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他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sup>①</sup>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虽然他沿用刘知几“独断之学”的提法并不足为训，“高明”“沈潜”的分类也不科学。

想要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从大角度对历史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当然历史是多层次的，所谓全局、整体，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史固然可以看作全局、整体，某一国家的历史、某一断代的历史、某一时期中社会某个侧面的或某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之类），以至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样可以作为全局、整体看待。但是，不管考察对象所涉时间空间跨度的大小，只要考察的目的在于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把视野放开，纵观全局，而略去一些无关的细节。略其所当略，才能详其所当详；轻其所当轻，才能重其所当重。比如考察某一时代某一城市的经济

<sup>①</sup> 《答客问中》，《文史通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页。

兴衰史，当然离不开对该城市各经济个体（店铺作坊之类）实际状况的考察。但是要研究明白该城市经济兴衰的历史全貌，绝不是把它所辖的经济个体的材料搜求齐全便可做到。这里的道理是很显然的：第一，搜集史料，没有疑问应该力求详尽，但是不可能把这一原则绝对化起来，以为一定要把一个城市某时期全部经济个体的状况巨细不遗、搜罗齐备，然后才能研究该城市该时期的经济史。试想，调查现实社会经济问题都可能也不必要穷尽一切细枝末节，更何况是去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状况呢？第二，为了研究某一城市某一时期经济的兴衰，搜集经济个体的资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个体的资料有无典型性还须具体分析。必须承认有些个体的状况可以说明整体的状况，而有些个体的状况则不足以说明整体状况。一家店铺的兴隆或倒闭，并不一定能够说明或标志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动向。正像微观经济效果和宏观经济效果有时会恰相背离那样，历史上某经济个体的兴衰，完全可能与经济整体的兴衰并不一致。第三，一个城市的经济兴衰，尚须作通局考察，不仅要联系该城市的当时的和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状况，而且还要把该城市的状况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与它的经济兴衰有关的各种经济联系和其他的诸种联系，这当然不是仅靠搜集它所包括的经济个体的资料所能代替的。由此可见，只有立足于丰富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又自觉地舍弃一些无关的历史细节，才可能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历史，透过繁复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固有规律。区别于主观臆说的、科学的宏观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乃至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得以存在，得到承认，这是历史学发展上的一大进步。没有宏观的历史研究，便不可能有现代的历史科学。

探索历史固有规律的过程，乃是一个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概括的过程、科学抽象的过程，也就是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过程。所以应当说，宏观的历史研究，既是依赖于微观研究的成果，但又有着微观历史研究所无法取代的特殊职能。也就是说，相对地离开微观角度而去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同样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历史学发展所必需的。况且，正如前面所说，高水平的微观历史研究，或者说对微观历史研究的高要求，严格说来也是离不开宏观的历史研究的。瞎子摸象，对一头象固然不可能取得真知，明眼人就一头象看一头象，难道就能取得对一头象的充分认识吗？事实上，对于任何个体事物，不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是无法孤立地观察清楚的。比如对一头象，要想真正认识它，那就不仅要作多种距离多种角度的观察（且不说对它内在的生理结构考察），而且需要把它放到象的群体中、放到动物的群体中、放到生物的总序列中进行多层次的动态观察。同此道理，对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案的微观考察，只有打开壁垒，置诸更宽阔的视野中，借宏观考察之助，才能取得更准确更深刻的研究效果。

正因为是一种配合的互助的关系，所以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应当构成统一的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宏微之异，是历史学者形成一种学术分工的客观依据之一。成果既然可以互相利用，研究也就可以各有所侧重，各有职守，不必包揽一切，去干那些事倍功半的低效劳动。在历史学发展到现代的条件下，不必要求一切从事微观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用同样的精力去进行宏观历史研究，也不必要求一切从事宏观研究的历史学家用同样的精力去进行微观历史研究。一切都自己动手，好像是很值得称赞的，其实恰恰是落后的手工业方式。愈来愈借助

于合理分工和成果的互相利用，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大势和优势。反对“史人”相轻，既承认从事微观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劳动价值，又承认从事宏观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劳动价值，进而承认二者相互促进的劳动价值，那么大概可以期望获得“融宏微于一体”的重大的历史科学的成果了。

宏观历史研究，当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过多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的。例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就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或者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求常求变，或者通过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这样才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常求同，发现和把握历史的一般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无共同规律可循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变求异，发现和把握历史的特殊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没有血肉没有丰富内容的干瘪的哲学教科书。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通过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分析，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例如，对于人类历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略去若干过渡性的阶段，无疑可分作三个大阶段：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即阶级产生以前的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高级的无阶级社会（即阶级消灭以后的无阶级社会）。人类历史呈现出这种最为显著的阶段性，正是以不同历史阶段间巨大的差异表明人类社会沿着怎样一条轨道螺旋式地前进。然而异中又可求同，可以从这迥异的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它们存在着共同的、亦即人类历史

的一般发展规律。它们的社会面貌固然如此悬殊，然而所以会形成这样不同的社会面貌，归根结底，又各自取决于各该历史阶段上生产关系的状况和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状况和性质，归根结底，又为各该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由此可见，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规律，是上述时叙相联的三个历史阶段上共存的、亦即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一般规律。同时，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又使人们可以从同中求异。上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分别寓于不同的形态之中。在无阶级社会里和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一般规律，是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或者说，它分别表现为特殊规律。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规律，往往通过或者说主要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而这一特殊形态或特殊规律，在无阶级的历史阶段上当然不会存在。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规律，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对这种特殊规律的科学考察，才可能获得对于一般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特殊规律的存在，不是一般规律的否定，而是从历史阶段的嬗变中证实着一般规律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规律的产生、存在和消亡，不都是证明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的性质非随之变更不可，这是不顾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考察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由于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的；或者说，由于是把这种特殊规律放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加以比较，进行考察的，所以这种考察才可能构成对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及其固有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从宏观上对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科学地论证了阶级社会及其特有